

年选
大系

2003 NIANDU XINYI XIFANG
WENLUN XUAN

2003

年度新译

王逢振 主编

◆ 漓江出版社

西方文论选



2003 NIANDU
WENLUN XUAN



2003

年度新译

西方文论选

王逢振 主编

◆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3 年度新译西方文论选/王逢振主编.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04. 2
(2003 年选系列)

ISBN 7-5407-3112-5

I . 2... II . 王... III . 文艺理论—西方国家—文集 IV . I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13063 号

2003 年度新译西方文论选

作者◎王逢振 主编

责任编辑◎邹湘侨

封面设计◎罗 云

出版发行◎漓江出版社

社址◎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编◎541002

电话◎(0773)2821573 2863956(营销部) 2865335(邮购)

传真◎(0773)2821268 2802018

E-mail: ljcs@public.glptt.gx.cn

http://www.lijiang-pub.com

印制◎湖南地质测绘印刷厂

开本◎890×1240 1/32

字数◎227 千字

印张◎9.25

版次◎2004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7-5407-3112-5/I·1897

定价◎16.00 元

漓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前 言

王逢振

《2003 年度新译西方文论选》是该套书的第四卷。在前几卷里，我一直采取分门别类的方式。但这种做法并不十分严谨，因为各类之间相互交叉，有着内在的联系。所以，这卷不再分类，而是以书名“文论”一以贯之。当然，在编选之际也有总体上的考虑。最近一个时期，听到不少关于文化研究的议论，褒贬不一，为了给读者提供参考，这卷主要集中于文化研究的主题。

有人担心，[大]文化研究正在形成强势，会压制甚至取消传统的文学研究和审美研究。这种担心一方面表明了文化研究的力量和挑战，但同时也存在着对文化研究的误解。在很大程度上，西方的文化研究由文学研究发展而来，在批评理论发展的基础上，人们用文学研究的方法分析种种社会文化现象和文化制品，像分析文学文本一样，把社会文化现象和文化制品当作文本，以各种批评理论进行分析。因此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文化研究的对象非常广泛，几乎无所不包，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更贴近现实生活，所以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发展迅速，在学术界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潮流。但是，文化研究并不排斥文学研究和审美研究，它们仍然是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实际上，文化研究大大促进了文学研究，由于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视域，文学研究也得到了巨大发展，只要看看近二十年出版的文学研究著作的内容和数量，这一点很容易得到证实。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担心呢?我个人以为是习惯势力所致。一般说,在思想生活里,人们很容易形成思维定势,产生排他心理,固守自己的学科领域,不允许任何挑战和冲击。毫无疑问,谁都不会否认传统文学研究和审美研究的价值,但不能因此而排斥新的思潮,更不能让新的思潮倒退。当然,文化研究并不是十全十美,无懈可击的。可是,正如我们常说的那样,应该博采众家之长,吸收一切有益的东西。因此,对待文化研究,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吸收其合理的精华,而不是囿于狭隘的门户之见,进行抵制和排斥。

其实,一切事物都处于发展变化之中。传统的文学研究也在发展变化。以前不被重视的作品,可能会凸现出来;而以前的经典,也可能在发展中发生变化。例如,十九世纪以前,大学不教小说,认为它不是文学,而今天小说已经成为文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华裔作家一直不被纳入美国文学教程,但随着族裔文化研究的发展,汤婷婷的作品已经进入课堂。事物的发展变化由多种因素决定,但最主要的是社会发展变化。文化研究之所以能够兴盛,无疑与社会的发展相关。

当前,全球化进程几乎使每一个国家都进入了它的轨道。全球化以前只是作为交流的概念,但现在已经被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的逻辑和战略,在它的决定性的影响下,民族—国家的生产和市场正在纳入单一的范畴。全球资本主义的欲望对传统的人类交往和再现形式构成了挑战和破坏。跨国资本以其统治的意识形态和技术似乎正在全世界消除差异,把一致性和标准化强加给人们的意识、情感、想像、动机、欲望和兴趣。为了获得多国的资本投入,为了追求被好莱坞电影浪漫化了的美国生活方式、时尚和价值,不发达国家和前现代化的国家正在对文化资本主义牺牲它们的自然环境、资源、传统和文化遗产。即使在中国,也出现了美国那种文化商业化和商业文化化的趋势。

面对这种形势，经济全球化是导致文化霸权还是多样化？是否可以将经济生产与文化生产分开？在全球化的今天，如果经济和文化是构成社会物质生产的两个方面，那么当地域经济进行重构之际，地域文化如何能保持不变？如果全球化意味着标准化或美国化，那么如何解释后福特主义的生产对文化、族裔、性别等差异的影响，以及每一种差异如何为资本的扩张提供机会？考虑到后现代的经济信息追求满足种族和文化的需求及爱好，这是否意味着晚期资本主义会把它的文化逻辑限制在已经现代化的西方？如果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而资本主义正在渗透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那么为什么后现代文化面临着各种本土的或民族的抵抗？人们如何评价这种抵抗？文化融合是现在常用的术语，那么融合是西方化的战略形式还是本土化的战略形式？融合是否会消除或掩盖西方或美国在文化方面的霸权？所有这些，都是有使命感的知识分子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而文化研究，正是在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中形成的。

对待文化研究，更多的应该从提高思想认识方面着眼，而不是单从研究对象着眼。那种批评放弃经典而研究大众文化或通俗文化的看法，实际上是在无意识地维护少数人的“象牙塔”，而忽视了社会的实际需要。当前，影视业、娱乐业、广告业、媒体工业以及互联网络的迅速发展，正在影响着整个社会文化和人们的心理构成，面对这些实际问题，有使命感的知识分子自然会做出反应，从理论和时间上作出自己的阐述。

其实，就目的而言，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应该是一致的，因为两者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使人类社会更加完善。因此两者应该相互促进，而不是相互排斥。至于那种说文化研究是“泛意识形态化”的指责，我想是一种过于狭隘的看法；因为在现在的世界上，意识形态几乎无处不在。反对文化研究，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

文化研究仍然方兴未艾。为了给读者提供必要的借鉴,《2003 年度新译西方文论选》着重选收了一些文化研究方面的文章。这些文章既涉及文化研究理论,也涉及文学作品,既涉及哲学和美学,也涉及当前的社会。它们不仅提供了文化研究的内容和方法,而且也表明了文化研究与文学和美学的关系。文化研究的先驱者爱德华·萨伊德刚刚去世,选收一篇回忆他的文章作为对他的纪念。

目 录

前言	
爱德华·萨伊德与我：回忆赫尔门山 威廉·斯帕诺斯 (1)	
后现代主义质疑历史	琳达·哈钦 (40)
另一种观点：后现代主义与对抗历史 莱恩·芬德利 (65)	
身体问题：社会理论的新近发展	布莱恩·特纳 (87)
“物质性”及其“他者”：语言与实体 理查德·特迪曼 (118)	
故事语言：一种神圣的治疗空间 麦地娜·萨丽芭 (137)	
世界主义，美国，福利国家	布鲁斯·罗宾斯 (153)
不可通约性的时代	林塞·沃特斯 (180)
美学：解释学与解构论的相遇	伽达默尔 杜特 (234)
新南非的学术自由	约翰·希金斯 (252)
不是“太好以至不真实”：弗洛伊德晚 年自我教育的幻想	丹尼尔·奥哈拉 (280)

爱德华·萨伊德与我：回忆赫尔门山

威廉·斯帕诺斯

但是，我经常听到在我的身后
时光飞轮朝我逼近。

——安德鲁·马维尔：《致害羞的女友》

正如哲学家们说的那样，要理解生活，必须回溯过去；这一点完全正确。但是，他们忘了另外一个命题，体验生活必需在未来时间中进行。如果我们仔细思考这种说法，那么，我们就会愈加清楚地认识到，对于生活的理解从来不可能在时间中进行，这仅仅因为我们从来都不可能从过去找到某个特定的时刻，并以此作为一个栖息地去理解生活。

——基尔凯郭尔

1

如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与爱德华·萨伊德的第一次直接交往是因为我请他为《疆界2》后现代主义专集写一篇文章；那个专集

名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由我和我的朋友、小说家罗伯特·克鲁伊奇（Robert Kroetsche）共同策划，当时是1969—1970年。那是我备受困顿的一年，那时，我作为福布兰特奖获得者在雅典大学研究美国文学。当时，受到杜鲁门主义影响的希腊右翼势力上台，他们以和平和秩序为旗号反对民主，在1967年发动了政变。不出人们所料，该政府得到了尼克松政府的支持，其专制统治已经登峰造极。同时，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对越南人民采取的残暴行径以及国内的人权运动引起了不小的压力，新批评及其封闭模式构成的权威虽然因此开始削弱，但这种模式在形式和内容两方面依然主宰着美国学界和批评领域。

在与萨伊德联络之前，我就已经阅读过他早期对约瑟夫·康拉德小说的论文以及后来被收入《开端》一书中的部分文章；我当时的感觉不仅仅是一种知识层面的亲近感，还有一种奇怪的、无法道明的心灵亲和感，不仅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一种感觉变得愈加强烈、明晰。正因为如此，我和我的朋友希望在美国学术界挑选一些学者，越过现代主义问题设定的疆界，请他们在首期文学批评专集中发表观点——现在看来，可以说，此举是为了探索“后现代主义”；这样一个词在当时并无力量，也缺乏意见一致的意义——不过我觉得爱德华应该是我们必须邀请的人选之一。

爱德华当时对现代主义一词的可操作性是否表示同意，我已经不记得了——我的感觉是，他虽然不完全反对，但也不太同意。尽管如此，在我向他发出邀请信以后不久，有一天晚上，他打电话到我家里，告诉我他接受邀请，并提出了可能的选题：谈一谈法国结构主义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当时的美国，尤其在文学批评领域，几乎没有人知道福柯（五年多以后，才有了法文版《戒规与惩处》1975，其英文版还得再等两年）；不然，就讨论关于“强势语言”和“弱势语言”之间的相对文化力量，如英语和法语

与阿拉伯语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由于我对福柯有些了解，所以就选了前者；不过，我并没有意识到，爱德华对后一种选择所作的解释，后来在他的《开端》一书（1975）中成为他对福柯的“世俗”概念以及对奥尔巴赫的语文学探究，当然，这也是他的《东方主义》的出发点（1978）。抑或可以这样说，他提出的两个选题，福柯的《戒规与惩处》的出版，最后都在那篇具有开创意义的有关后现代主义的论文中结合起来了。（他为《疆界2》撰写的那篇文章题目是《作为一种知识想像的米歇尔·福柯》，该文后来被收入《开端》一书。）

就我记忆所及，我与他在电话上的那次谈话十分正式。起初，他的语气听起来十分公事公办，彬彬有礼但很严肃，甚至有些过于严肃，颇有些距离，但是，后来当我们谈到那个专集的用意时，他调整了语气。我想，那表明他对我们的支持，同时也是表示他愿意缩短我们之间距离的一种友好姿态。我凭着自己这种不完全正确的理解，在后来的谈话中就简称他为“爱德”，但他礼貌而坚决地告诉我，希望我称他爱德华。这一态度令我费解，不仅让我吃惊，也让我感到有些窘迫。在接下来的谈话中，我有些不知所措，我们的谈话也就这样结束了。他这一令我费解的态度是我对萨伊德初次接触的最深刻印象，这一事件也决定了以后我在凡是有他在场时我必须保持的一个称呼习惯。直到现在，在我阅读他的回忆录时——特别是他在讲述爱德华这个名字的决定性意义时，他的母亲一直这么称呼他；他的母亲是巴勒斯坦裔美国人，既温柔慈爱得令他无法抗拒，又严肃挑剔得使他害怕，这种双重性使他处于一种分裂状态，一直如此——我这才开始认识到他那次为什么突然改变态度。

我对此事的追忆并不是因为我想回忆脑海里保持数年的那次电话谈话。相反，我希望从回忆中发现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的一些东西；我当时的尴尬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淡化——而随着我对

萨伊德的了解和思考逐渐加深,某些东西在我的意识里却变得渐渐清晰;当我阅读了他的回忆录之后,这些谜一样东西变得昭然若揭。1970年秋天的那个夜晚,我得知,20年前,1951年秋天至1953年春天,爱德华曾在赫尔门山就读。那是一个位于马萨诸塞州的一个男子私立中学;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完成一年研究生课程以后,曾在那里教了两年书。我记得他在回忆录里对那里的生活说得并不多。不过,他提到,虽然他并没有选修我讲授的课程,但他知道我在那里——或者说,他知道学生们强加给我的那个形象:一个过于严肃,难以接近,令人害怕的教师;此外,我的橄榄肤色使我在那个环境里显得很扎眼;也许还由于我那个非盎格鲁—萨克逊的姓氏,学生们叫我“Chico”。

我与爱德华之间后一次的交往是在1975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同样源于一次预想不到的电话,但这次我是作为哥伦比亚大学英文系招聘委员会的一名成员。我的学生保罗·鲍威(Paul Bove)应聘了;爱德华显然读过并且喜欢他写的《解构的阐释学》(一位文学史教授说过,这是“为美国大学认可的第一篇‘解构性质的’博士论文”),他担心哥伦比亚大学出于机构或世系的考虑只挑选所谓的“优秀分子”,所以,他打电话询问我对保罗·鲍威任职资格以及他作为一名教师、批评家和学者有什么看法。我很肯定地告诉他,这位年轻人富有非凡的批评才华——是我教过见过的学生中最优秀的——他热衷于文学领域的政治(我当时的意思可能指萨伊德后来称之为“世俗批评”的那一种),我告诉他,总有一天人们会听到他的批评之声。此外,我还告诉他,当《开端》一书出版时,是保罗·鲍威告诉我这一消息并建议我把整本书读完。在这次谈话中,我避免了上一次那样的尴尬。其间,我的直觉告诉我,爱德华对保罗·鲍威真的颇有兴趣,而且支持他的申请,而他所在的系可能反对录用本校以外的任何人,也拒绝录用一位毕业于一所公立研究生院的学生,更糟糕的是,该校建校还不到5

年。爱德华的折中姿态使我在心里对他产生了深深的亲切感。当我们的谈话快结束时，爱德华换了个话题，而他要说的内容以前他曾经告诉过我，而他显然忘了；他说，当我在赫尔门山教书期间，他也在那里。我并没有忘记我俩之间的这一缘分，但我没有多加注意，也没有多加思索。由于他将这件事与保罗·鲍威事件相连——我与爱德华曾经同在一个学校这件事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在我记忆的河流里变得活跃起来。自那以后，尤其当保罗来到哥伦比亚成为爱德华的同事和朋友以后，每当我听到有人说起爱德华的时候，我经常畅想我和他在那里的两年；在那两年里，我刚成为那里的教师，但生活对我而言却充满困顿；我想像，如果爱德华是我的学生，来听我那些不无反抗精神的英语课，那会是怎样的情景。

当保罗和他妻子卡洛尔来到纽约定居以后，我终于与爱德华见面了。保罗的住所在克勒蒙大街的一所公寓里，在第116大街和河滨车道之间；我经常去他们家。我曾有过几次与他面谈的机会，其中有一次在宾汉姆顿，是因为《疆界2》资助了一个专题，名为“当代美国批评领域的阅读问题”（1978年，4月）；这次专题是为了讨论自约翰·霍普金斯结构主义大会（1978，4月6日至8日）以后十年来的理论状况。在那次会议上，雅克·德里达发表了他的那篇宣言文章：《人文学科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嬉戏》。也就在这次会议上，爱德华发表了具有同样开拓性的文章《反思当代美国‘左派’批评》。在我看来，这篇文章标志着解构主义在美国学界的霸权地位开始走向消解。奇怪的是，在这次会议过程中，我与爱德华之间的交往仿佛是当年在赫尔门山时候的翻版。我想，也许正是会议阻碍了我和他之间来往的可能性。现在回想起来，在一定程度上，我一直希望与他来往，只不过还没有强烈到主动提出的程度。也许还有这样一个原因：对于我来说，在电话里与我说话的那个爱德华·萨伊德不同于现实生活中的爱德华·萨伊德

——这个巴勒斯坦裔少年，不知何故被他父母送到了新英格兰一所与世隔绝的寄宿学校；那是一所由两位笃信新教伦理的牧师在20世纪初创办的。与我说话的那个萨伊德，是《东方主义》的作者，那个巴勒斯坦裔美国人，他凭着富有力度的的人文知识和令人敬畏的历史感，使具有抵抗精神的美国学界和美国媒体意识到美国式的全球化前景并不美妙。这就是说，我觉得他在赫尔门山的那些年对他来说并不重要。

最近我读了他的回忆录《格格不入》¹，使我的这一看法明晰起来。他之所以写这部回忆录，是由于他发现自己身患不治之症；令我感到惊讶的是，在这本令人感动的书中，他用了整整一章叙述了他流亡在赫尔门山的两年。我后来了解的萨伊德——一位致力于巴勒斯坦政治的美国学者和行动主义者，《开端》，《东方主义》，《巴勒斯坦问题》，《世界，文本以及批评家》，《文化和帝国主义》的作者——我原以为，他在哈佛，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生学习对他后来的发展具有关键意义。因为在那儿，他初次接触了一些杰出的现代比较学学者，这些人物的名字犹如奏鸣曲里的低音主题，在他的作品里随处可见：利奥·斯皮泽，西奥多·阿多诺，安东尼·葛兰西，还有背井离乡的奥尔巴赫。不过，使我颇为惊讶的是，事实并非我想像的那样。在《格格不入》一书中，他将这些几乎当做事后的回忆。当然，爱德华毫不费力地将比较法与流亡主题相连接——断然拒绝了传统的文学研究学科以及文学经典观念，由此开创了一种跨学科或称作全方位的方法——借用马丁·海德格尔的说法，它是背井离乡的陌生人主题（Abgeschiedene）。与之相反，我觉得这是一个关于一位阿拉伯少年的故事，他生性敏感，备感困惑；而他的父亲却对美国颇有好感，因此，虽然他的母亲有些不乐意，但最终还是表示同意，于是，爱德华离开了那个至少已经变得熟悉的流亡地（开罗—黎巴嫩区），来到了在地理和文化上都显得隔绝而陌生的北美，位于伯纳德斯通的赫尔门山

男校。那里几乎就是一个美国乡村，位于佛蒙特州的布拉特尔伯洛和马萨诸塞州的格林菲尔德之间；在那儿，不可捉摸的命运全然不顾那些被选择者自身的愿望，对他们任意摆布。1950年秋季，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完成研究生学习后也来到了这个地方。

我们经米尔瓦基路的铁路，从米德威机场乘TWA航空公司的飞机返回纽约（从威斯康星的麦迪逊）；而在劳动节过后的第一天，终于乘火车离开中央车站，前往赫尔门山。关于这段在白河中转的长途火车旅行（在这之前几天，我在克莱蒙中转站乘坐同一次火车到赫尔门山，那个车站在新罕布什尔州纽波特我父母家以西约10英里），我只记得最后来到了马萨诸塞州一个乡间小站，那儿，有一辆出租车，孤零零的，它把我们带到终点，大约两英里以外的那个学校。由于我的父母随后将立即乘坐回程车返回纽约，所以我只有不到一小时的时间可以和他们在一起。他们陪着我找到我的房间，然后，我父母与校长作了简短的谈话，我母亲用15分钟帮我安顿好行李，并铺好床（我的室友早已安顿整齐）。忙完这一切，他们就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站在令人生畏的宿舍楼（克罗斯利楼）出口处；我看着他们渐渐远去，只觉得阵阵哽咽。突然袭上心头的空虚感使我预感到，我在赫尔门山的第一学年将苦不堪言，但我不得不忍受（这两点后来都得到了验证），不过，我也明白我应该立刻回房间，去感受我母亲刚才片刻停留后尚存的气息，以及她双手留下的痕迹，或许她还会留有一张留言条。

回到宿舍，迎接我的是一位金发青年，他差不多与我同龄。“你好！我叫鲍波·萨利斯波里，你的室友。”他愉快的声音使我无暇寻觅我母亲留下的芳香，同时也意识到自己已经来了，这已经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225）

对我而言,赫尔门山在我的记忆里并没有留下太多的回忆。在那两年里,我与爱德华都生活在那个偏僻的角落。其间,许多经历充斥着那一段日子生活,以至于那两年几乎已经从我的意识里消褪了。用爱德华那种平淡而具有讥讽意味的话来说,我们俩都“已经来了”。当我阅读爱德华开篇处这些极富情感的叙述时,我感到那个被遗忘的,也许还是被压抑的世界突然浮现在我的意识中,像一朵已经枯萎的花朵突然绽放出生命。虽然占据我意识的不是我自己的故事,而是一位年轻的巴勒斯坦流亡者的幽灵。这个幽灵重复出现,使我想起了自己在赫尔门山任教的那段岁月。

经过了漫长的 50 年以后,我对赫尔门山的回忆,已经不如爱德华描述的那般清晰。但是,他在《格格不入》一书中关于那所学校的描述激活了我对往事的回忆(海德格尔用 *Wiederholung* 一词描述的有差异的相似性)。换言之,这种东西使我回到了那个遥远的过去,并使我第一次去了解它。具体地讲,这种回忆证实了爱德华的描述,那个学校的确具有强烈的排外倾向,总让人觉得被排斥,十分痛苦;除此以外,它还让我回忆起那段生活中的另一个侧面,而这一面,当时只有 15 岁的爱德华是无法了解的,即便是现在,从他对往事的回忆角度看,我认为他依然无从感受。这一点,我将在下文中提及。过去曾经是边缘的,但却让人无法漠视,更重要的是,它现在依然存在于美国知识分子的生活;它迫使我对令人窒息的美国白人上层社会以及新教徒阶层的生活和环境进行重新审视。

2

在爱德华看来,赫尔门山自始至终“完全排外,毫无生机”(226);它不仅是一个自然地点,同时还是一个地理和文化空间;

以他这样一位流亡者的眼光来看，这个地方，无论是地理风貌还是自然气候，都与他自小成长的中东地区大不一样；更重要的是，这里的文化氛围中弥漫着一种疏离感和排外性，这一切使他觉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格格不入”。在回忆录中，他讲述了在那个毫无愉快可言的陌生环境中的两个例外。一是该校风琴手卡尔顿·劳米迪厄（Carleton L'Hommedieu）的音乐，它使爱德华找回了他对钢琴音乐的兴趣。（劳米迪厄在全体教师和学生必须参加的每星期四次的礼拜仪式上演奏，虽然在学生们眼里他是一位“瘦骨嶙峋的艺术家”，但是，“他演奏的序曲和尾声强劲有力”〔232〕；在我眼里，这位艺术家是一位边缘人物，他行为端正，疏离在我认识的这个乱世之外；与爱德华一样，我当时十分喜欢巴赫音乐节上通过新的帕波洛牌录音机录制的巴赫音乐，这对那种死气沉沉的教区活动确实具有一种弥补作用。）另一件事，使我感到有些费解，爱德华选了杰克·鲍德文的课；鲍德文是我的同事，我们都在英文系，但他的资历在我之上。他的课有一个月的时间必须用于细读莎士比亚的《麦克白》。据爱德华所说，这对他具有非同寻常的改变作用：

具体地讲，我第一次感受到老师如何将一个主题展现在我面前，这种方式使我立刻作出了积极的反应。以前所有受到压抑的学术研究（在开罗的维多利亚学院）——那种模式仅仅为了得到彻底而准确的答案，以满足标准化的教学计划，适应那种只是炫耀记忆力而不是测试批评或者想像力的考试——我觉得自己被唤醒了。从此以后，我对于知识发现（以及自我发现）的复杂过程的兴趣就没有停止。无论如何，一种格格不入的感觉，从没有过家的感觉，至少在赫尔门山没有，这一事实激励着我寻找自己的家园，不是社会意义上的，而是知识意义上的。（231）